

# 丘吉尔与 戴高乐

[法]F·克·沙迪



# 丘吉尔与 戴高乐

〔法〕F·克沙迪

武仁译

新华出版社

**丘吉尔与戴高乐**

〔法〕F·克沙迪 著

武 仁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邢台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插页2张 346,000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邢台第一次印刷

印数:1—5,600册

ISBN 7-5011-1276-2/K·171 定价:8.00元

# 前 言

《丘吉尔与戴高乐》一书于 1981 年首次印行以来，间或被人称之为“有关这一主题的最佳著作”。这话可能不错，因为本书也是唯一的一部。不管怎样，要把本世纪两位最杰出的伟人之间史诗般的会面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冲突写成枯燥乏味的文字，恐怕也得有某种独到的文学天赋才行。在过去 8 年中，一些新的档案材料公之于众，更多的文件呈现在人们面前，许多见证人追思往事。这种情况在戴高乐身上更使人欣喜，因为有关他在战时岁月中情况的材料不如温斯顿·丘吉尔的来得丰富。新的文件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理解“自由法兰西”运动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一系列亲眼目睹者和当事人的证言也多少有助于人们了解中东地区法英对抗中更鲜为人知的情况。

6 年前，《丘吉尔与戴高乐》一书的法文版曾在法国引起过某种轰动，原因之一就在于以前没有人认真地对戴高乐战时回忆录是否严格符合历史事实提出疑问。很自然，随之而来的争论引出了一些新的材料，这一版利用了这些材料。对于所有那些提供了历史见证或指出第一版中不够准确的地方的人士，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F. 克沙迪

1989 年 9 月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引言                           | 1   |
| 1 亲法与仇英                      | 15  |
| 2 风暴来临                       | 26  |
| 3 海难沉船                       | 37  |
| 4 升起旗帜                       | 65  |
| 5 合作关系                       | 91  |
| 6 首次大冲突                      | 125 |
| 7 所谓的自由法国人                   | 151 |
| 8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                  | 173 |
| 9 权宜之计                       | 203 |
| 10 强迫婚姻                      | 223 |
| 11 曲折的统一之路                   | 250 |
| 12 勉强承认                      | 275 |
| 13 是占领区盟国军政府<br>还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 295 |
| 14 最漫长的一夜                    | 331 |
| 15 解放                        | 354 |
| 16 英国的死对头                    | 383 |
| 17 真诚和解                      | 413 |

## 引 言

1911年10月成为英王陛下海军大臣的那个人决非一般。他声名显赫的先辈和他父亲短暂然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当时在英国尽人皆知。同样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曾作为一名青年军官在印度,苏丹和南非有过非凡表现,他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颇具天赋的大手笔,并已先后作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殖民部副大臣、贸易委员会主席和内政大臣在政界有过10年的不凡经历。然而那些熟悉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并曾在早期岁月与他共过事的人明白,他还同时具有诸多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素质:无穷无尽的干劲和精力,高度的道义感和勇气,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对国王和国家的赤诚,以及最后,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热望。1911年,欧洲形势日趋紧张,这类事件显然已迫在眉睫,而新任海军大臣无疑将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朝迈进白厅,温斯顿·丘吉尔立即着手使海军为将要到来的欧洲冲突做好准备。尽管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希望可以避免战争,然而一旦意识到战争在所难免,他就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和浓厚的兴趣投入行动。1914年7月28日,他没有等待内阁的决定,即命令第一舰队进入北海的作战位置。5天之后,大不列颠参战,而国王陛下政府的成员不能不对丘吉尔在履行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职责中表现出来的激情和果敢感到吃惊。事实上,他将战斗到战争终结,甚至到和平到来之后。到1914年10月,这位海军大臣已经负责起英国的空防,派出3个中队的海军航空兵、装甲车和

一个炮兵营到法国，6次越过英吉利海峡去检查工事，鼓舞士气。他甚至还到了被围困的安特卫普，在那儿，他给首相拍发了一份电报，自愿辞去大臣职务，去指挥负责保卫这个比利时港口的部队。

回到伦敦以后，温斯顿·丘吉尔加倍努力，要将一种进攻精神注入到总的战略当中去。每当他发现任何计划、行动、策略或者设想可能导致在战场上取胜，这位海军大臣总是立刻抓住不放，并以极大的热情使之得到批准。对他来说，击败德国人已成为他唯一关心的事情。1914年11月，他在主持海军飞行员对腓特烈港策佩林式飞机基地的空袭。此前几周，他曾要求制造“能越过战壕的车辆”，到了1915年1月，这种车辆已成为“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很快，这种早期的坦克就在他的亲自监督下由海军部加以开发。与此同时，丘吉尔还曾要求进攻德国的博卡姆岛，然而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主张实施另一项更为大胆的行动：突破达达尼尔海峡，他认为这是期待已久的手段，能够缩短在法国北部的堑壕和泥淖中僵持不下的战争。然而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攻击以及随后在加利波利半岛进行的登陆作战相继失利。温斯顿·丘吉尔为此受到指责，并被迫辞去海军大臣职务。

1915年5月之后，丘吉尔挂了个闲差：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法官，这样，他除了任命各郡地方法官外无所事事。然而，人们无法将他排斥在战争活动之外：很快，他就向首相、陆军部和自己在海军部的继任人发出没完没了的备忘录，要求增援东方战线，重新发起对达达尼尔地区的攻击，加速开发坦克，建立独立的空军部门，甚至“立即派出一支英法联军，在15万由英国用日制步枪装备起来的俄国人增援之下，挥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当丘吉尔听说内阁准备放弃达达尼尔地区时，他辞去了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上的职务。到1915年11月，我们发现他作为“掷弹兵近卫军”中的一名少校出现在法国前线。他一共在弗朗德斯被炮弹炸得千疮百孔的泥泞战壕中呆了6个月，那些同他一起度过这段岁月的人似乎都认为，温斯顿·丘吉尔对战争感到着迷，丝毫

不惧怕危险。但是到了1916年春天,丘吉尔少校又回到了下院,并且对政府耗费钱财、犹豫不决的战争政策大加挞伐。然而他没有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追随者,并且受到新闻界的恶毒中伤。因此,直到14个月之后他才被任命为劳埃德·乔治内阁的军需大臣,从而使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再度得到发挥。这位新任军需大臣并不满足于把军火和战争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组织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不断前往法国战场和向劳埃德·乔治送交建议信件,而是在又一次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赢得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sup>①</sup>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丘吉尔在内阁中的同事曾认真地看待过他那不计其数、有时并非妥当的战略计划,然而对劳埃德·乔治政府来说,他那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干劲一直到战争最终结束都显然是一笔财富。

恢复和平之后,丘吉尔成为主管国防和空军的国务大臣。在这个位置上,他指挥了英国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干涉。在担任了3年殖民地大臣之后,丘吉尔又于1924年回到保守党的行列中,成为一名不甚成功的财政大臣,然而在1929年以后,他发现在印度法案问题上与本党意见相左,并且于1931年辞去了在保守党影子内阁中的职务。从那时以后直到30年代末期,丘吉尔在英国政坛上都是一个茕茕孑立的孤独者。但是,欧洲形势的变化很快就使他有了一项应当加以捍卫的事业,一项对他的丰富想象力和浓郁的爱国主义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事业,这就是捍卫英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文明,使之不致沦于德国纳粹精神的黑暗与致命危险之中。

当极权主义思潮在整个欧洲甚嚣尘上的时候,丘吉尔比绝大多数同胞更早地意识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所推行的裁军政策可能带来的危险。1931年6月29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在下院宣布,他将力求在欧洲实现“全面”裁减军备,然后再进行“进一步削减”。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回答道,英国的军备已经进行了

---

① 其中包括又一项夺取博卡姆岛和西尔特岛的计划。



削减，目前“极端虚弱”，陆军被“裁减到最低限度”，不过是一支“徒有其名的警察部队”，空军实力只及法国的 1/8。

随着希特勒上台执政以及欧洲面临的危险随之增长，丘吉尔对麦克唐纳和平主义政策的鞭挞自然变得更为凶猛。1933 年 3 月 23 日他宣称，麦克唐纳执掌英国外交政策 4 年，使英国更接近战争，变得“更虚弱，更贫穷和更缺乏防卫能力”；至于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丘吉尔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庄严和旷日持久的闹剧”。同年，丘吉尔在回答约翰·西蒙勋爵提出的达成“国际裁军协议”的呼吁时警告说，英国的军备已经减少到“危险的边缘。——不，已经落入危险的深渊”。1934 年 7 月，他不无嘲讽地评论道，“这个时代充满了无休止的雄辩和夸夸其谈，饱含善意的情感和盛宴，然而最近几年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不断增长，不断而且迅速地增加军备……”。

从那以后，丘吉尔从不间断地呼吁本国政府加强英国的防务，成倍地扩大空军，设立国防部和供应部，改组工业结构使之转向战争用途，使舰队现代化，加强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友和支持国联。在无数演讲和文章中，他谴责在德国发生的清洗和种族迫害，谴责德国重整军备和莱茵区的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威胁波兰。在更多的文章和讲演中，他指出德国正以危险的速度重整军备。在 1934 年他警告说，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相当于英国的 2/3，1935 年他说双方实力已经持平，1936 年德国空军已强出 50%，1938 年则强出一倍。丘吉尔以其雄辩之才，动人之语、冷嘲热讽和犀利谈锋，毫不留情地申斥政府在重整军备方面动作迟缓，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议会和公众舆论发出呼吁。在 1936 年 11 月的一次关于防务问题的辩论中，他在下院宣称：

海军大臣有天晚上在讲演中……说，“我们总是在探讨立场。”他向我们保证说，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变化的。我敢肯定这话不错。任何人都能看到立场是什么。政府根本就拿不定主意，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让首相拿定主意。于是他们继续处

于荒诞不经的悖谬之中，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固执地随波逐流，坚定地反复无常，竭尽全力地无所作为。于是，我们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将宝贵的、可能是性命攸关的岁月花在准备上，准备将不列颠养大——送给蝗虫去享用。

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拉姆齐·麦克唐纳受到和平主义情绪的强烈影响，斯坦利·鲍德温担心重整军备会动摇保守党在选举中的地位，而内维尔·张伯伦则坚信，他可以靠着同独裁者达成协议来避免战争。就这样，先后3位首相靠着对过去的错误和当时的疏忽视而不见而避开所有攻击，认为丘吉尔关于军备的数字歪曲了事实，他的警告是杞人忧天，他的规劝是穷兵黩武，他的讲演是摇唇鼓舌，而他这个人尽管天资聪颖却乖僻反常。结果，丘吉尔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而在议会中，他也颇有形影相吊的意味，其他议员和公众舆论的钦佩、好笑和无动于衷兼而有之的态度注视着他那雄辩的冷嘲热讽，却依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严重性。正如菲利普·格达拉后来说的：“丘吉尔先生反复预言惩罚即将临头，对此人们就像对清真寺内宣告祈祷时刻已到的声音一样熟悉。”

无论这10年在政治问题上无人理睬的日子对丘吉尔来说有多么艰难——用莫顿少校的话来说，“他恰似一个玩具被人搞坏了的孩子”——事实上，他的孤立处境比大多数类似的遭遇更多些生气。至少有一点，他锲而不舍，坚信自己在正确地分析当前和预见未来。毕竟，早在1921年他就要人们提防，“目前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存在着的可怕积怨、恐惧和仇视，如不加以阻止，几乎肯定会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使我们刚刚目睹其结束的争斗重新爆发。”11年之后，即1932年，他又说：“这一群群结实的条顿族小伙子行进在德国的大街和公路上，眼中闪烁着愿为祖国做出牺牲的光芒。他们并非在追寻地位。他们所寻找的是武器，而他们一旦有了武器，请相信我，他们就会要求归还失去的领土和殖民地。这一要求一旦提出，就将撼动甚至摧垮我们提到的每一个国家和一些我没有提到的国家。”

丘吉尔坚信他了解希特勒的野心之所在，而且同 1915 年一样，他毫不怀疑自己能比任何其他英国人更成功地动员和领导本民族的力量应付迫在眉睫的冲突。的确，这样认为的并非只有他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这个似乎处于孤立之中的人联系，其中最早的一个大概是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德斯蒙德·莫顿少校。30 年代，莫顿少校在为严密监视德国工业发展情况而设立的工业情报中心工作，并开始向丘吉尔提供德国重整军备的事实和数据。丘吉尔在谴责英国重整军备速度太慢时有效地利用了那些材料。到 1935 年，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主动提供信息，其中包括拉尔夫·威格拉姆，他向丘吉尔提供了在外交部所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德国飞机生产的数据——而政府本身拒绝认真看待这些数据。几个月之后，海军本部第一首长查特菲尔德给丘吉尔写了第一封有关海军的需要和困难的信。查特菲尔德写道，“我们有多年的欠帐要还，高射炮和防空舰船并不是一拨款马上就能生产出来的。今后三四年中我们必将面临极大的危险……”1936 年 5 月，皇家空军一所训练学校的校长托尔·安德森空军少校也开始向丘吉尔提供反映皇家空军人员、训练和设施严重不足的图表和材料，仅仅几个月之后，皇家坦克军团总监霍巴特则要求同丘吉尔谈一些重要的机密情况。

另外一些官员更公开地向丘吉尔提供材料，力图获得他的支持，利用他的能力和地位。其中包括新任空军国务大臣菲利普·坝利夫—利斯特勋爵。他在 1935 年 7 月曾问斯坦利·鲍德温能否让丘吉尔参加空防研究小组委员会。鲍德温同意了，于是丘吉尔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这使他得到许多空防方面的有用材料——并且知道了类似委员会的工作多么拖拉。以后几年当中，另外一些高级官员试图证明重整军备的工作正令人满意地进行，以此来平息他的不满。于是参谋总长送给丘吉尔一份有关坦克计划的备忘录，防务协调大臣邀请他参观奥斯汀沙多工厂，空军国务大臣提出让他看看新的雷达站。丘吉尔总是很感兴趣，但又看出许多问题。他

抱怨说没有生产中型坦克,也没有为预防空袭适当地保护工厂和雷达站,然而在这些过程中,他无疑获得了有关本国资源和防务的大量知识。

丘吉尔没有成为一个无人理睬的孤独者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对头,甚至包括先后几任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的首相在内,都明白他的价值,并且相应行事。1929年,丘吉尔向德斯蒙德·莫顿少校索要机密材料时,莫顿去见拉姆齐·麦克唐纳,问他应该怎么办。那位首相回答道:“他想要知道的都告诉他,让他了解实情。”他将这一特许写在纸上,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继任者鲍德温和张伯伦也同样予以批准,鉴于丘吉尔经常采用这些材料来指责当局的失误,这种作法一定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特许从未收回。原因很简单:三位首相都了解丘吉尔,以及他在战争中的价值。1935年11月,斯坦利·鲍德温向一位友人写道,“如果战争爆发——而眼下没人敢说不会——我们必须使他准备好作我们的战时首相。”就连将丘吉尔称之为“难以共事的伙伴”并因此竭尽全力将他排除在政府之外的张伯伦也很清楚战争将使丘吉尔回到前台,他在1939年夏天写道,“我们越临近战争,他的机遇就越好,反之亦然。”

唯一的障碍就在于,直到很晚,几乎是太晚的时候,张伯伦都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他甚至对朋友们说,“提名温斯顿·丘吉尔入阁,等于向柏林发出公开交战的信息”。就这样,1939年夏天,65岁的丘吉尔只能在一旁吃惊而又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威胁着欧洲和平的直接而又致命的危险。在35年当中,他取得了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首相都更丰富多样的政治经验。在10年当中,他在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力图将自己的国家从正在发展的形势中挽救出来。在30年当中,他熟知英国防务力量的状况,并坚信自己有着激发这些力量的精力、魄力和想象力。但是他仍然不在台上。

1912年10月,一名少尉从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了。据一名

教官说,他“除了身高之外,一切平平”。这充其量只是个没有洞察力的评语,因为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身上没有任何一般的东西。他的同级毕业生和较少偏见的教官都惊奇的注意到,这个形单影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历史感、非凡的记忆力和对戎马生涯的渴望。此外,他的父亲,严以律己、博闻强记的亨利·戴高乐还使他具有“某种对法国的看法”,兼有崇尚、敬畏,忠于法兰西祖国往日的荣耀和今天的利益。夏尔·戴高乐后来写道,“我并不怀疑,法兰西将经历巨大的磨难,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它作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

1913年,戴高乐少尉加入了驻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该团由菲利普·贝当上校指挥,他当时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军官,在战略问题上具有近乎异端看法。<sup>①</sup>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2日爆发时,戴高乐已升为中尉,在33步兵团第一营服役。

在默兹河的血腥战场上,在尚佩恩战线凄风苦雨的战壕里,在凡尔登被夷为平地的断墙残垣边,先是中尉,后来是上尉的戴高乐在战斗中勇敢过人,3次负伤。第3次是1916年3月2日在杜奥芒,他在率领连队进行白刃格斗时受了重伤,并被误传为阵亡。于是当时已声名显赫的贝当将军追授他一枚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和一份倍加赞扬的荣誉状。<sup>②</sup>但是戴高乐上尉没有死;他被敌人俘获,作为德国的战俘直到战争结束。

戴高乐先是被关押在腓特烈堡,后来转到因戈尔施塔特,其间他并没有束手待毙。在多次不成功的逃跑尝试之间,他密切注视着战争的进展,并对难友广为解说军事战略问题及战事的最新发展。

---

<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法国盛行的军事思想将步兵的攻击作用视为军事战略中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因素。而贝当上校则强调事先构筑的工事和大规模炮火掩护在任何战略行动中的关键作用。

<sup>②</sup> “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度机智和正直著称;所在营受到猛烈轰炸,伤亡严重时,敌人包围了该连,他率领士兵勇猛出击、投入肉搏,他认为这是唯一与他军人荣誉情感相符的出路。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无以伦比的优秀军官。”

一个最新事态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坦克的出现和初期运用。在这些强加于他的闲散日月中，他似乎对此思考了很长时间。<sup>①</sup>

1918年11月的停战，结束了这位年轻上尉并非情愿的流放生活。1919年5月，他前往波兰。在那里，他同波兰军队一道同苏联人作战，然后在华沙附近的雷姆伯托军官学校担任了讲授步兵战术的讲师。1921年底，他被国防部召回法国，在圣西尔军事学院任军事史助教。1922年，戴高乐自己成了享有盛誉的高等军事学院的学生，他后来在那里成了一个才智过人然而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该校的教学思想完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斗应在准备好的阵地上进行，得到大规模炮火的支持，实施几乎彻头彻尾的防御战略。而戴高乐则毫不隐讳地表示他拒绝阵地战的思想，而且并不信奉防御战略——这使他在军校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中不大受欢迎。结果，尽管他在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却被派往远离巴黎的莱茵部队总参谋部。

然而这个不守传统的年轻上尉却有一个大权在握、声名显赫的庇护者：凡尔登的胜利者，挽救了法国陆军的菲利普·贝当元帅。自从1913年起，贝当就很欣赏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才干，戴高乐当时对军事学院过时的军事思想进行的顽强斗争无疑使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单枪匹马对战前时期危险的军事理论进行的圣战。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年中，上司们对戴高乐上尉的恶意很大程度上被这位强有力的元帅的支持所抵销。

作为第一步，1925年秋天戴高乐奉调离开美因兹，受命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顾问团成员，而副主席正是贝当本人<sup>②</sup>。这个职务算不上闲职美差，但却使戴高乐处于非常接近法国军事决策中心的有利地位。此后，他担任了一段驻特里尔的第19山地

---

① 当时那里的其他战俘包括后来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还有卡特鲁少校，在本书叙述中我们将多次遇到他。

② 贝当还是陆军总监，和战时全法部队司令。

步兵营指挥官，并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随后，戴高乐少校被调入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这是一个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设立的机构。他在那里呆了6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至1937年，我在14任政府中，通过从事计划工作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本国防务的政治、技术和行政活动。特别是使我熟悉有关安全的计划以及安德烈·达迪欧和保罗—彭古尔在日内瓦提出的对军备的限制；当杜梅内阁在元首（指希特勒——译注）上台后决定推行一条不同的路线时为他们提供有关决策的基础；为国家的战时组织法案进行无休无止的工作，并探讨动员民政、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措施。我所必须从事的工作，我所目睹的讨论，我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使我看到了我们的丰富资源，但也使我看到国家的虚弱。

在这个享有特权的有利地位上，戴高乐中校的确看到了很多东西，而他对看到的并不满意：由于宪法体制上的弱点和议会的阴谋诡计，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整个军事机器臃肿沉重，官僚主义盛行，几近过时；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武器装备自1870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自1918年以来则毫无变化；总参谋部迷信防御战略的力量以及工事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适逢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且毫不隐瞒他决心粉碎凡尔赛和约并相应地着手大规模重整军备。因此，法国除非采取必要步骤使力量对比恢复到有利于自己的状态，否则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是怎么办？戴高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最后提出了细致入微的答案，其要点归纳在1934年5月出版的一本篇幅不长的书中，书名为《走向职业化军队》。

用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全书用纯正和经典的风格写成，一开始即指出法国东北边境极端脆弱，历来使入侵者得以通过最短的和最直接的路线深入法国心脏。戴高乐写道，“壁垒上的这一缺口是本国历来的薄弱环节……在这一性命攸关的通道上，我们不久前掩埋了我国1/3的青年男子……至少，这个

受到很差保护的民族保持着警惕？20 个世纪回答说，并非如此！”20 世纪也不例外：仅凭工事并不能保护这个民族，在紧急状态下大规模征兵并不适用于现代，而服役的期限越来越短，在不到 10 年中，从 3 年减为 1 年。更糟糕的是制度上的弱点与法国人争吵和分裂的民族倾向。那么解救办法何在？

“一支职业化军队，”戴高乐答道，“一支由 10 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恢复法兰西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失去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其作战手段是：6 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装甲、履带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 3 个旅：1 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1 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1 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持。每个坦克旅将包括 500 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冲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sup>①</sup>

戴高乐中校不遗余力地使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从几个密友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特别是厄米尔·梅耶中校、吕西安·纳尚上校和一个叫让·奥布尔坦的律师。他在左翼议员中找到了几个盟友——包括马赛尔·德阿、菲利普·塞尔、雷奥·拉格朗热，在右派中也有某些支持。他从好几家报纸那儿得到帮助，右派和左派的都有，如《巴黎回声报》、《时报》和《秩序报》。他还赢得了一位极有影响的政客，法国前部长保罗·雷诺的合作，保证在议会中捍卫他的计划。最后，此时贝当元帅正担任国防部长。有了

---

<sup>①</sup> 戴高乐的建议中并无崭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埃蒂安纳上校在 1914 年就提出了极为相似的建议，当时坦克尚未发展起来，而他已呼吁建造 400 辆装甲车辆。战后，法国的埃蒂安纳将军和杜蒙将军，英国的富勒将军和利德尔·哈特上尉完善了装甲战的理论，而戴高乐就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受到启发的。德国人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帮助,有根据相信理性将最终取胜。

然而并非如此。那时贝当元帅已经 78 岁,不再能够接受新思想;此外,他对戴高乐的同情已明显地冷了下来,他们的关系不久以后就恶化了。<sup>①</sup> 保罗·雷诺在议会中卓有成效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他甚至还在 1935 年 3 月 15 日提出了一份防务法案修正案,其中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但是左翼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害怕极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而中派则认为法国无力负担需要增加的费用。结果修正案立刻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

但是,戴高乐思想的最严重障碍自然是法国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那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考虑问题——持续不断的战线、沟壕,步兵在大规模炮火掩护下谨慎前进,对这些人来说戴高乐的计划毫无用处:只会使军队分裂,影响步兵的士气,使资源不能用于固定的防务工事,而最坏的是可能影响他们的仕途。至于说坦克,法国陆军装备的够多了,而且使用的也算得法:分散到各个步兵单位去为缓慢前进的步兵提供保护和支持,如同 1918 年一样。接替贝当担任法国陆军总监的魏刚将军,魏刚将军的继任者甘末林将军,以及法国历任国防部长所持有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因此,戴高乐的想法为军界高层所拒绝,对法国公众舆论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实际上,《走向职业化军队》一书在法国只销出 700 册,然而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好得多。

在随后几年中,戴高乐仍以令人吃惊的坚韧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对本国同胞发出警告。为了在时尚未为晚之时唤醒公众和说服当权者,议会、新闻界、广播、政党等他都利用过。1935 年底,德国有了一个装甲师,并宣布准备再建立几个。翌年初,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而这并没有引起法国或英国什么反应。不久,德

---

<sup>①</sup> 1938 年戴高乐发表《法国及其军队》一书时曾将该书献给贝当元帅,但却不是按照元帅希望的条件。随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贝当到 1940 年也没有原谅戴高乐。